

---

## 傳播新制度經濟史初探

王盈勛\*

---

###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制度經濟史的研究方法如何運用在傳播研究上。以傳播科技的進展作為傳播史的斷代基礎，使得傳播史的研究經常帶有「科技決定論」的色彩，以社會文化等因素解釋傳播史的進展，卻又經常缺少一致而系統性的理論基礎。

新制度經濟史理論主張，制度變革所導致的交易成本下降，經常是一項社會體制的生產力得以提升、制度在競爭與演化中得以存活下來的關鍵。本研究指出，在解釋傳播體制的變遷上，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能夠做出卓越的貢獻。

關鍵字：傳播史、新制度經濟史、科技決定論

---

\*王盈勛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共同學科助理教授。  
Email: tamsuiwang@gmail.com

## 壹、前言

「傳播史」是一個相當獨特的研究領域。不像「傳播理論」，或是其他傳播領域的次學門，由傳播學者來進行研究，是一件再理所當然不過的事情。但是不曾認識任何傳播理論，或是與傳播領域沒有任何淵源的「史學家」，一樣也可以進行傳播史的研究，像是 R. Darnton (2000) 或是 A. Chandler 與 J. Cortada (2003)；沒有受過任何史學訓練的傳播學者，也有可能寫出一本影響深遠的傳播史著作，像是 W. Schramm (1988游梓翔、吳韻儀譯，1996)。更何況，被定位為既不是傳播學者，也不是史學家的學者，也有可能寫出一本可以被定位是傳播史著作的書，例如 S. R. Fischer (2004)。

那麼，什麼是傳播史呢？尼諾 (J. Nerone) 指出，傳播學者所寫的史學著作，主要可以分成兩大領域 (Nerone, 2006)。其一，主要是加拿大學派 (the Canadian School)，代表性人物是殷尼斯 (H. A. Innis) 和麥克魯漢 (H. M. McLuhan) 及其在美國的追隨者，像是 J. W. Carey 和 N. Postman 等人，他們關心的焦點是「媒體科技的大敘述」 (the grand narrative of media technologies)。另外一支，則是新聞史與媒體言論自由史的傳統史學。前者重形式，後者重內容。尼諾認為，傳播領域的史學研究者通常要比歷史學家更偏好「巨型論述」 (grand narrative)，他們相信某種線性的進步觀，相信歷史往某個特定的方向邁進，不管是共產主義社會或是新聞自由。相對來說，歷史學家則比較偏重資料的耙梳，著眼於斷代或是個別事件的因果解釋。

本研究的重點在於指出，這兩派的研究在過去數十年間雖然有重大的貢獻，卻也有其嚴重不足之處，特別是在解釋傳播體制的演進與變革方面，這兩個取徑都有其力有未逮的地方，新制度經濟史作為一種史學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地彌補前述的兩個取徑之不足。

司馬遷在他所著的《史記》自序中提到，他的史學觀念的核心思

想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對於變遷的解釋自古以來就是史學家關心的重心。

過去傳播史的研究，經常自覺或不自覺地以「科技」的出現，作為一種新的傳播形式得以崛起的關鍵因素，因而也就或多或少帶有「科技決定論」的色彩。文化研究的先驅者之一威廉士(R. Williams)在《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一書中，駁斥了科技決定論一派的簡單思考(Williams, 1974馮建三譯, 1995)。他強調，傳播科技的出現與演化，並不是像科技決定論者所說的，突然從實驗室中冒出，接著就橫掃全世界，而是受到人類及科技外的多重社會力量所決定，這當中，威廉士又特別強調人類「意圖」的重要性。

新制度經濟的史學分析則是強調「制度」在歷史變遷中的重要性。新制度經濟的史學分析發現，在歷史上的許多時期，科技並無重大進展，但是社會的生產力卻有驚人幅度的躍升，根本的原因是社會的「制度」因素有了重大的變革，大大降低了社會的「交易成本」或是「制度成本」。

本研究即以此為出發點，探討以新制度經濟史學的方法，來研究傳播史的演進與變遷的可能性，並分析其與其他傳播史研究取徑的異同。

## 貳、加拿大學派的傳播經濟史觀

受正統經濟學訓練，最後卻以傳播為研究領域的學者當中，影響最深遠的應該是殷尼斯和史麥塞(D. W. Smythe)。加拿大籍的經濟學家殷尼斯的著作旁徵博引，往往不是那麼容易歸類，但是他橫跨大時空範圍的論述方式，對古代帝國興衰的詮釋方法，稱他為「傳播史學家」應無太大疑義。

對殷尼斯(1951)而言,歷史可以被理解為,被不同的偏向(biases)切割為一系列的歷史階段。這些偏向間的相互作用,限制與轉化了組織與行動的本質。在不同層次的分析中,殷尼斯用知識壟斷(knowledge monopolies)、歷史帝國(historical empires)以及社會與文化的競爭性秩序(competing form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order)來描述這樣的相互作用。

在特定的歷史階段,特定的偏向取得優勢,而且這樣的偏向會主導與限制社會關係的走向。殷尼斯認為,每個歷史階段的偏向的特性,可以用主要被使用的媒體或傳播工具來加以界定。有些媒體是時間偏向,適合長久保存(像是石碑),有些媒體則是空間偏向,有利於遠距離傳播(像是紙)。

殷尼斯這種以(媒體)科技來解釋帝國興衰的史觀,自然很容易被認為具有科技決定論的色彩。但是 Babe(2008)認為,殷尼斯並不是「硬派」科技決定論者(hard technological or media determinist),殷尼斯認為媒介對時間與空間的影響,必須放在媒介被運用的社會與經濟脈絡下來加以理解。殷尼斯指出,科技是與既有的制度性權力和知識的社會結構呈現一種「辯證性的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殷尼斯事實上與「制度經濟學」頗有淵源。殷尼斯自美國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雖然殷尼斯於芝加哥大學求學之際,舊制度經濟學的奠基者韋伯倫(T. Veblen)已經離開芝大,但是殷尼斯仍然受到韋伯倫很深的影響,在殷尼斯(1950)的《帝國與傳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當中,殷尼斯也曾明文提及韋伯倫的貢獻。Barnes(1999)甚至認為,殷尼斯的思考方式與韋伯倫有許多相似之處,稱他為「加拿大的韋伯倫」。

繼殷尼斯之後的是麥克魯漢,他同樣強調傳播科技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重要性。兩者的差別在於,殷尼斯著重科技對社會組織與文化

的影響，麥克魯漢則將焦點放在傳播科技如何主宰了人類的感官發展。

受到殷尼斯、麥克魯漢等「加拿大學派」的影響，儘管未曾言明，許多傳播史的寫作幾乎就等同於（傳播）科技史，特別是在大時空範圍的傳播史著作。尼諾（2006）認為，（傳播）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脈絡，是「科技的社會建構」（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科技的社會建構論有一派是從文化面向出發的，像是強調媒介形式的重要性的麥克魯漢、Carey 以及 Postman 等人，也有從權力觀點出發的傅科（M. Foucault）、德勒茲和瓜達里（G. Deleuze & F. Guattari）等人，另外一派則是從經濟觀點來看的史麥塞和許勒（H. Schiller）等人，但仍擁有「科技的社會建構」這樣一個共同的語彙。

其他經典的傳播科技史研究還包括了，Eisenstein（1979）探討印刷媒體在擴散、保存與標準化資訊上發揮的作用，以及這些作用如何促成了新教改革、文藝復興、以及科學革命；Steinberg（1961）則是檢視了自從活字印刷發明以來的五百多年間印刷書的演進。Anderson（1991）探討了傳播科技（印刷品）在促使想像的共同體成其可能所發揮的作用。McChesney（1993）的美國廣播政策史研究則是強調政治經濟。

如果說過去的傳播史研究並不重視「制度」重要性，也並不正確。Schramm（1988游梓翔、吳韻儀譯，1996）的《人類傳播史》（*The Story of Human Communication*），便有很大的篇幅在論述各種社會「機制」在傳播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像是城市、學校，以及大眾傳播本身。新制度經濟史獨特的分析視角在於，將表面上看來相當紛雜的各種制度，統攝在一個一致性與系統性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或說是「制度成本」（institutional cost）概念之下，因而可以讓分析更具有高度的理論性與解釋力。

對比來看，殷尼斯認為，一個帝國的興衰，和一個政治組織能否在時間偏向與空間偏向之間取得平衡有很大關係。在殷尼斯眼中，所謂適當的治理，就是要克服在任何歷史階段特定媒介在偏向上的一面倒優勢。大型政治組織能否永續，要看它能否克服媒體的偏向過度強調時間或空間的問題。能夠繁榮興盛的帝國，都是被不只一種媒體所影響的帝國，一種媒體的過度偏向，能夠被另外一種媒體加以平衡。

從人類的歷史來看，對時間與空間的控制的需求總是持續在擺盪當中，而文明就是在這兩者取得平衡之際漸趨成熟，直到這樣的平衡被打破為止。換言之，殷尼斯認為，歷史的變遷，乃是時間與空間的媒介的交互作用所導致的。

Babe (2008) 認為，殷尼斯是以一個社會或文明的物質條件（基礎）來為歷史定錨。像古代埃及刻在石板上的象形文字，有助於時間偏向的神權統治，後來的草紙運用則有利於抄寫員的權威，並鼓勵了數學與科學的發展。羅馬後來征服了埃及，得到了草紙的供給，是羅馬得以成為一個大型行政帝國的關鍵。

徐桂權 (2004) 認為，同為經濟學者出身、加拿大學派的創始人殷尼斯對於傳播史的研究，焦點幾乎都是放在傳播工具（科技）對於社會的影響，較少顧及社會制度對於傳播體制的影響。麥克魯漢將西方文明分為四個階段—口述、文字、印刷與電傳，明顯也是以傳播科技作為文明進程的區隔。徐桂權認為，新制度經濟學能夠彌補殷尼斯媒介理論中，制度層面論述的不足，兩者都擺脫了傳統經濟學理論的束縛，但是新制度經濟是把制度視為人類歷史運轉的軸心，而非技術。

### 參、什麼是傳播新制度經濟史？

新制度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基礎，是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的觀念並不複雜，寇斯 (R. H. Coase) 從一個最簡單的疑問開始了他

的探究 (Coase, 1937): 如果市場機制真如新古典主義所說的那樣完美, 那麼為何還會有廠商存在? 理論上市場應該是充斥著如原子般的個體, 但實際上, 即使是像美國這樣高度崇尚市場經濟的國家, 仍舊存在著動輒數十萬人的大型企業。寇斯的回答則是, 運用市場做為一種資源的分配與統治機制, 是有成本。廠商內部的行政控制作為一種資源分配與統治機制一樣有成本, 因此組織人類行為的社會制度呈現何種樣貌, 要看交易成本與行政成本的相對高低而定。

用這樣的概念來進行產業組織的研究, 一個產業之所以由市場、大型企業、或是網路關係取得主導性地位的產業樣貌, 是源自產業的屬性、環境變動的快慢、信任關係的高低等等所導致的交易成本與行政成本落差; 用這樣的分析方法來進行傳播政策的研究, 則是分析不同的政策所可能導致的制度成本差異—中央計畫經濟的國家可以視為是高度仰賴行政控制的組織形式, 類似大型企業的運作方式; 用交易成本的概念來進行傳播史的研究, 則是帶有「制度演化」的色彩—具備制度成本優勢的組織模式將會淘汰制度成本偏高的社會組織模式, 而能夠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社會將會更為繁榮興盛。

另一位新制度經濟學的關鍵人物諾斯 (D. C. North) 的主要貢獻, 則是將交易成本的概念如何應用到史學研究予以深化與理論化。諾斯 (1997) 指出, 儘管有些史學研究的確從不同的理論中得到一些啟發, 但是能夠幫助分析制度變遷現象的理論卻很少。在缺少有效理論的情況下, 史學家只能侷限於記錄、描述與歸納, 而且願意承認這樣的侷限性的史學家很少。這也導致優秀的史學作品, 常常不是奠基於明確的前提的邏輯推衍, 而是直覺知識。這樣的直覺之所以經常能夠戰勝數學, 並不是因為歷史學家盲目地拒絕拜倒在科學的祭壇之下, 而是他們能夠運用的理論通常解釋能力很差, 與事實相去甚遠。

諾斯認為, 能夠預言未來和解釋過去的理论, 只能從關注邏輯的理論家跟解釋過去的歷史學家間的互動得來。

新制度經濟學，自從兩位經濟學家諾斯與寇斯在 1990 年代接踵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後，在經濟學界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有漸成顯學之勢<sup>1</sup>。寇斯雖非史學家，但其著作，多數由產業的歷史考察出發，詳細評估一個產業當中不同歷史階段的管制對於產業的實質影響，像是燈塔、廣播、以及電視等產業，而不是抽象的理論推衍。因此，寇斯的著作具有明顯的歷史實證主義色彩，儘管他所使用的方法並不是美國學者慣用的數學工具。另外一位諾斯，則是以經濟史做為其主要的研究對象。諾斯（1997）認為，寇斯關心的是決定企業存在與否的交易成本，他自己關注的核心則是決定整個經濟績效的交易成本。

王盈勛（2010）的研究指出，以寇斯為首的傳播新制度經濟思想有幾個核心。首先，寇斯是價格體系作為資源分配手段的支持者，卻不認為價格是傳播資源分配的唯一最佳方式。寇斯指出，只有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價格機制才是唯一最佳資源分配方式，但是這在真實世界中並不存在。

其次，寇斯認為，任何的資源或是權力指派方式都有人受益，有人受害，言論自由或是廣告市場也不例外。權力或資源分配最重要的依據，是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受益大於受害）。權力或是資源分配最重要的方式（不管是政策或是法院判決），是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讓資源能夠流向能夠創造最大收益的人身上。

此外寇斯也認為，傳播產業和其他產業一樣，都可以用相同的方法來管制，但是這並不同於所有產業的管制與法規都應該是一樣的。

邱彭生（2005）表示，受到寇斯啟發的經濟史研究，至少包括以下兩個範疇：其一，是偏重組織外部環境變動的「制度分析」（以諾

---

<sup>1</sup> 將寇斯的交易成本理論進一步深化的 O. E. Williamson，也在 2009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斯為代表性人物)，將經濟史研究由講究量化的「新經濟史」，轉向強調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的「新制度經濟史」，並發展出由「經濟組織、國家與法律、意識形態」三個層面架構起來的經濟變遷史的鉅型理論。其二則是偏重組織內部結構變動的「制度分析」（以 O. E. Williamson 為代表人物），分析的出發點是由「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的角度對資本主義企業進行分析，以及 A. Chandler、S. Cochran 等學者的企業史研究。

新制度經濟史學，是以修正新古典主義計量史學為出發點。奠基於新古典理論的計量史學，是運用數學計量的方法，來設定與檢驗歷史模型。在計量史學之前的經濟史，因為缺少結構完整的理論和統計資料，因此很難做出具有普遍性的結論，或是超出個案本身特性的分析。

但是新古典的計量史學理論也有其問題。新古典理論關心的是固定時間點下的資源配置，這對以「解釋隨時間而改變為核心問題」的歷史學家而言，是非常嚴重的缺陷。此外，新古典假設資源配置是在沒有磨擦的情況下，也就是制度不存在或不重要，而這明顯與對歷史的查考不相符。諾斯認為，只有在「國家不干預、交易成本為零、偏好具有持久性」的前提之下，新古典模型才能成為有效解釋歷史變遷的理論。這兩個問題加起來，讓計量史學忽略了經濟史真正的目的：設法解釋歷經時間之下的社會成長、停滯與衰敗等各種型態，以及探討人類互動必然產生的磨擦，如何造成極端分歧的結果。諾斯指出，人類歷史上的許多社會與政治實體，在技術水平與成就上是相近的，但是在經濟表現與文明進程上卻有顯著的不同，而這只有將「制度」因素納入考慮，才能獲得有效而完整的解釋。

諾斯（1990劉瑞華譯，1994）指出，知識和技術存量決定了人類活動的上限，但它們本身並不能決定在這些限度內，人類如何取得成功--當多數的技術都是人皆可得的情況下，為何富國與窮國的差距依

舊如此明顯？諾斯認為，政治和經濟組織的結構（也就是「制度」上的差異），決定了一個經濟的實績，以及知識和技術存量的增長速度。

理解制度結構的兩個主要基石則是國家理論和產權理論。因為國家界定產權結構，因而國家理論是根本性的（而這也是新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根本差異）。諾斯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進入了政治經濟的領域，因為能夠被清楚界定與實施的產權制度，需要一個有效率的政治體制。諾斯（1981）指出，其理論的基石是：

1. 描述一種體制中激勵個人與組織的產權理論；
2. 界定實施產權的國家理論；
3. 影響人們對「客觀」存在變化的不同反應的意識型態。

以諾斯（1968）自己的研究為例，他所展示的，是在 1600-1850 年的兩百五十年間，世界並未出現以輪船替代帆船之類的革命性技術躍進，但是在這段期間內，海洋運輸的生產力卻有大幅的增長，原因就在於當時船運與市場制度的重大變革—政府大力掃蕩海盜，讓海運的維安成本大幅降低（也就是諾斯所說的「產權」的維護）。

在實證研究方面，這領域的研究仍然相當有限。Mueller（2002）的著作運用制度經濟的分析方法，分析了網域名稱統治分配制度的浮現過程，可以算是一種網際網路發展史的嘗試。Benkler（2002）則是試圖運用交易成本的概念，來解釋網路開放原始碼社群的崛起。

費夫賀與馬爾坦（L. Febvre & H. Martin）的史學鉅著《印刷書的誕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在實質上是用社會制度的變革，解釋了印刷書在歐洲擴散開來的原因，但是著作並未使用「制度成本」或是「交易成本」的概念來涵蓋它（Febvre & Martin, 1958/李鴻志譯，2005）。

近年來風起雲湧的開放原始碼運動以及創用運動（Creative

Commons)，則是提供了另外一個從交易成本的角度來分析智慧財產權的機會。秘魯的經濟學家De Soto（2003/王曉冬譯，2005）指出，沒有產權的清楚界定，就沒有/無法交易，一個產業就無法蓬勃發展。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面對的問題不是沒有智慧財產權，而是過於嚴苛的智慧財產權。科技大廠間的智慧財產權訴訟，動輒以數十億美元計算<sup>2</sup>，科技大廠也開始以法律訴訟作為威嚇小廠商的工作。史丹福大學法律系教授Lessig（2004/劉靜怡譯，2008）指出，智慧財產權是必要的，但是絕不是越嚴格越好，如果拍攝一部紀錄片，鏡頭中不小心拍攝到的電視畫面也要付給電視台上萬美元的「版權費用」，或是建置電影資料庫，還得逐一徵得電影史上每一個演員的同意，這樣的紀錄片或是電影資料庫將永遠無法完成。從交易成本的角度來分析，過於嚴苛的智慧財產權制度同樣會使交易成本驟然升高，其危及一個產業的存續的程度，不亞於不成熟的智慧財產權制度。

#### 肆、新制度經濟學與新制度主義的異同

值得一提的是，社會科學中近年蓬勃興盛的「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與經濟學中新制度經濟(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兩者同樣關注「制度」的重要性，關心的焦點卻未盡相同，經常很容易造成混淆。Drobak & Nye（1997）指出，被外界稱之為「新制度主義」（包括新制度主義與新制度經濟學）的著作，通常關注以下四個研究領域，但也幾乎沒有任何學者同時橫跨這四個領域的研究：

1. 交易成本與產權；
2. 政治經濟學與公共選擇；
3. 數量經濟史；
4. 認識、意識型態與路徑依賴的作用。

新制度主義主要盛行於政治學與社會學界，主要是探究制度間的相互作用、及其如何影響社會運作；新制度經濟學的焦點則放在交易

<sup>2</sup> 如 2007 年 2 月，美國聖地牙哥法院宣判微軟需賠償 Alcatel-Lucent 15.2 億美金。

成本 (transaction costs) 的組成與變動在歷史變遷與社會組織形塑中的作用。像王躍生 (1997) 在《新制度主義》一書的導論中就開宗明義地說：「『新制度主義』者，『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之謂也」，但實則全書談的都是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而非一般華文世界所稱的新制度主義。

Star (2004) 的《媒體的誕生》(*The Creation of the Media*) 是典型從新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出發的傳播研究，論證傳播科技的發展，多半是由有意識地在辯論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政治決策所催生的。這些決策既是 (傳播科技) 發展的路徑，卻也是未來發展的限制之所在。尼諾 (2006) 認為，Star 的分析雖然涵蓋了文化與政治經濟兩個面向，但是政治經濟顯然佔據了比較重要的地位。約莫是同一個時間點完成的 Sterne (2004) 著作《聽得見的過去》(*The Audible Past*) 則是偏重文化面向。

區分新制度主義與新制度經濟學間的差異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為兩者都強調「制度」的重要性，能夠修正新古典主義對於市場與個人選擇的過度強調 (新制度主義著眼於制度在人追求自利過程中的制約作用；新制度經濟學則是主張，在交易必然存在成本的真實世界中，市場不必然是最有效率的一種制度)，也能為傳播政治經濟學傳統反對市場，但是往往也只能提供「公共」這樣抽象的替代性制度選項的思維，提供一個可具體分析制度優劣利弊的理論取徑 (王盈勛，2010)。

## 伍、結論與研究限制

解釋傳播體制的演進，「科技」在過去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變因。新制度經濟史學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詮釋傳播史的方法。這樣的方法，以「交易成本」或是「制度成本」概念為核心，認為制度變遷最主要的動因源自制度成本的變動。

諾斯（1981）指出，集體行動是社會變遷的基本力量，但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來詮釋社會變遷，無法將為何「搭便車」（free riding）行為不會導致集體行動的瓦解納入模型當中。

馬克思（K. Marx）把技術變化，而不是古典理論中的人口增長，視為變遷的原動力。他批評了馬爾薩斯（T. R. Malthus）認為人類依賴物質而生存，以及人口出生率是由文化所決定的觀點。在馬克思的理論中，技術的變化導致生產技術的進步，而其潛力無法在現有的經濟組織實現，這也是馬克思著名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的論點。馬克思預言，將會有一個充滿活力的新興階級起來推翻既有的體制，創建一個無產階級能夠將新技術的潛力轉化為現實的新型產權形式。

諾斯讚揚，馬克思的理論是所有既有的理論當中，對長時間範圍的歷史變遷最有解釋力的，因為是馬克思具備了新古典理論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型態。馬克思強調產權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中的重要性，以及現有的產權制度與技術的潛力間的矛盾性，這是一個很大的貢獻。馬克思認為，技術的變化造成了這種矛盾性，但是社會的變革只有透過階級鬥爭才能實現。

但是諾斯也批評，馬克思主義強調階級是結構變遷的主要動因，同樣是忽略了搭便車問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們會置自我利益於不顧，而是按照一個階級的利益行事，甚至做出相當大的個人犧牲<sup>3</sup>。馬克思同時也忽略了階級內的差異，因而無法解釋階級為何無法成為集體行動的團體。此外，諾斯也指出，馬克思漠視技術以外的歷史變遷解釋因素，以及缺乏解釋技術變遷的速率的一般性理論。

總的來說，新制度經濟史的分析方法，或許能在左（馬克思的歷

---

<sup>3</sup> 但是諾斯的批評也有其問題，雖然各種組織中的搭便車行為非常普遍，但是我們似乎也不能忽略，許多改變歷史的重大事件，的確是由許多不計個人利害得失的人所完成的。

史觀)右(新古典主義史觀)之間,開創出一套全新的詮釋歷史變遷的理論。新制度經濟史與馬克思主義的史觀同樣強調產權、意識型態與國家的重要性,因此同樣可以納入「政治經濟學」的範疇,但是對於產權之為用,卻又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諾斯肯定新古典主義計量史學在理論化上貢獻,但是同時也批評計量史學流於靜態,無法解釋歷史的動態變遷,並且忽略了制度的關鍵性作用。

費夫賀與馬爾坦的研究指明,印刷書在歐洲得以廣為流傳,除了技術因素之外,著作權制度的建立、銷售中間人的出現、付款機制的成熟化、以及書籍交易市集的蓬勃發展等因素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限制,有待進一步的發展。諾斯定義的經濟增長,是以總產出、人均產出以及社會收入的分配等來定義績效。但是當我們進行傳播史的研究時,制度變遷所帶來的績效需要適度的加以修正,無法直接加以援用。

交易成本的概念經常也被批評過於廣泛、籠統,馮建三(2008)批評,交易成本似乎是一個可左可右的概念, Benham & Benham (2000)認為交易成本範圍的界定莫衷一是,因此很難加以衡量。此外,交易成本與社會制度、政府政策乃至文化習俗都有關聯,而這些因素都很難量化。儘管目前也有一些學者投入如何衡量交易成本的研究,如 Wang (2003),但是距離可量化操作仍有一段距離。

## 參考書目

王盈勛(2010)。〈傳播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 《傳播與社會學刊》，12: 55-78。
- 王曉冬譯（2005）。《資本的秘密》。台北：經濟新潮社。（原書 De Soto, H. [2003].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王躍生（1997）。《新制度主義》。臺北：揚智。
- 李鴻志譯（2005）。《印刷書的誕生》。台北：貓頭鷹。（原書 Febvre, L. & Martin, H. [1958] *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 London, UK: Verso.）
- 邱彭生（2005）。〈經濟、法律與文化：介紹「新制度經濟史」研究的若干趨向〉，台大歷史系中國史（二）課程演講，台北：台灣大學。取自  
<http://idv.sinica.edu.tw/pengshan/IntroducingNIEH2005May.pdf>
- 徐桂權（2004）。〈傳播圖景中的制度—由英尼斯的媒介理論談起〉，《國際新聞界》，3: 49-53。
- 游梓翔、吳韻儀譯（1996）。《人類傳播史》。臺北：遠流。（原書 Schramm, W. [1988]. *The stor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Cave painting to microchip*. New York, NY: Harper and Row.）
- 馮建三（2008）。跋。〈科斯的傳媒論述：與激進的反政府論對話〉。《傳媒、市場與民主》（頁 377-400）。馮建三譯。台北：巨流。（原書 Baker, C.E. [2002]. *Media, markets,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馮建三譯（1995）。《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台北：遠流。（原書 Williams, R. [197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UK: Fontana.）
- 劉瑞華譯（1994）。《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台北：時報出版。（原書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劉靜怡譯（2008）。《誰綁架了文化創意？如何找回我們的「自由文化」》。台北：早安財經。（原書 Lessig, L. [2004] *Free culture*:

- 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creativity*. London, UK: Penguin Book.)
-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UK: Verso Press.
- Babe, R. E. (2008). Innis and the emergence of Canadian communication/media studies. *Global Media Journal*, 1(1), 9-23.
- Benham, R., & Benham, J. (2000). Measuring the costs of exchange. In C. Ménard (Ed.), *Institutions, 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s: perspectives from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p. 367-375).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Benkler, Y. (2002). Coase's penguin, or, Linux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Yale Law Journal*, 112 (3), 369-446.
- Coase, R.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s*, 4(16), 386-405.
- Chandler, A. & Cortada, J. (2003). *A nation transformed by information: How information has shape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rnton, R. (2000). An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y: news and the media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1), 1-35.
- Drobak, J. & Nye, J. (1997)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Eisenstein, E.L. (1979)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Fischer, S. R. (2004). *History of writing*. London, UK: Reaktion.
- Innis, H. A. (1950).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Toronto, C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Innis, H. A. (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s*. Toronto, C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McChesney, R. W. (1993). *Mass media, telecommunications, and democrac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eller, M. L. (2002). *Ruling the root: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the taming of cyberspa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Nerone, J. (2006).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history,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3(3), 245-262.
- North, D. C. (1968).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 1600-185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 (5), 953-970.
- North, D.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Y: Norton.
- North D. C. (1997). Prologue. In Drobak, J. & Nye, J (Eds.), *The frontiers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p. 3-12).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Star, P. (2004). *The creation of the media: political origins of modern communic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 Steinberg, S. H. (1961).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Books.
- Sterne, J. (2004). *The audible past: Cultural origins of sound reprodu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N. (2003) Measuring transaction costs: An incomplete survey, Ronald Coase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No. 2.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ase.org/workingpapers/wp-2.pdf>

#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s an Approach to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Ying-Xun Wang\*

---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how the methodology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ould be applied to the historical studies of communications. In the past, the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history mainly treated technology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historical changes. There were cultural explanations of communication histories, but such explanations fell short of systematic and consiste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s illuminates the fact that the changes of 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al) costs could be the primary cause of historical changes of communication system. The studies of communication history can benefit a lot from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history.

**Keywords:** communication history,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history, technology determinism, institution

---

\* Ying-Xun Wang is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at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mail: tamsuiwang@gmail.com